

“技科学”语境下的后人类之痛

——对厄休拉·勒奎因《变化的位面》的技术解读

程 静

(南华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1)

[摘 要] 厄休拉·勒奎因的《变化的位面》以斯威夫特式的艺术想象,虚构了两个过分使用基因技术进行身体修复和身体潜能扩张的故事,再现了当代技科学语境下的“技术态身体”现象。借助于基因改造的悲剧,故事展示了基因技术在试图突破人类认知和智力局限的同时,颠覆了“人类本质”,并带来了难以逆转的后人类之痛。文章追踪了作者对“后人类主义”技术观念的批判,指出该小说警示人类不要毫无顾忌地使用技术打破人类和非人类生命的界限,或无限拓展身体潜能,并强调了人类“精神性”对技术灾难的反向平衡作用。

[关键词] 技科学语境; 体修复术; 后人类主义; 人类精神性

[中图分类号] N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4)06-0109-06

厄休拉·勒奎因(Ursula Le Guin, 1929—)是美国当代著名作家,曾获美国国家图书奖、普利策奖、星云奖、雨果奖等多项大奖。她的作品在世界范围内受到广泛的关注。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学界对其作品的阐释大都集中在她的道家思想、生态女性主义、乌托邦政治、后女性主义、神话—原型批评等论题。对她作品中反复重现的技科学^①主题的研究,仅散见于几部专著中,如彭斯的《政治理论、科学小说和乌托邦文学》(2008)^[1],但不够深透。A. M. 克拉克认为勒奎因小说强调科学存在的目的是发现而非剥削。既然科学家对世界产生了冲击,就应该为恢复自然秩序承担责任^[2]。而中国学界很少有人关注勒奎因小说的技术主题。本文所阐释的《变化的位面》(*The Changing Planes*, 2003)是一部斯威夫特式的游记叙事小说,从人类学的视野反思人类社会和当今世界的各种文化现象,受到很多评论家的赞赏,并在2007年由梁宇晗译成汉语出版。其中的两个短篇“伊斯拉克玉米粥”和“永醒者之岛”以奇妙的想象力,表现了作者对基因工程的反思。

在1995年题为“我是个女作家,西部作家”的访谈中,勒奎因说,“我并不写高技术的科学小说。我的技术倾向于复杂,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无形的”^[3]。在《变化的位面》的“作者手记”中,作者写

道:“错误、恐惧和痛苦是发明之母。受到局限的身体知道并珍惜思维的自由。”^[4]此处的“发明”指“具体的技术”或融入人类生活中的技术,突出了技术、身体和人类情感之间的联系。这一创作思想关注具体的技术而非整体的技术,呼应着20世纪70年代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小说的多个故事由位面旅行技术而促成的旅行叙事连贯在一起。所谓位面,就是作者虚构的与地球相关的世界。为疏解等候飞机的枯燥和乘坐飞机的辛劳,第一人称叙事者发现位面的时间切换允许旅行者在别的位面或位面管理局的小旅店呆上几天,而机场仅仅过去了十分钟。它的原理是:不同的位面处于不同的时间流之中,时间的相对化和中心化消除了不同世界之间的距离,使得人类能够在机场候机的时候访问别的位面,又能及时返回机场。位面旅行技术由小说中的人物、辛辛那提的席达·杜利普发明,即“只要做一个简单的手势——做出这手势比描述这手势还要简单得多——她就可以去任何地方。这是因为她已经在位面之间了”^[5]。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地球人若想穿越位面旅行,“就必须要有相当程度的紧张、悲哀、消化不良以及厌倦情绪才可以”;而且“必须在机场里才能变化位面”,而别的位面的居民要变化位面,只需摆一个简单的姿势^{[5]6}。第一人称叙事者带领

[收稿日期] 2014-10-20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世纪美国文学中的医学想象与帝国政治”资助(编号:13BWW044);湖南省教育厅项目“选择的力量:对厄休拉·勒奎因作品的生态批评研究”资助(编号:09C866)

[作者简介] 程静(1966—),女,河南信阳人,南华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读者走过 16 个位面,其中的“伊斯拉克”和“奥里奇”位面,展现了技术态身体^②发展到极致时的噩梦。

基因技术原本属于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研究的问题,但它日益吸引着文学和文学研究者的注意。技科学现象指的是现代技术与科学融合在一起的现象,这种现象嵌入于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与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态等交织在一起,成为一种控制国家和个人命运的“元叙事”,这一现象迫使人类对技术作跨学科的探讨,并在巨大的技术利益和风险之间作出最好的抉择。鉴于小说中突出的技术恶托邦叙事和技术态身体的主题,本文拟从基因技术与身体修复术的关系解读“伊斯拉克玉米粥”和“永醒者之岛”的故事,认为极端的基因技术对身体的重新刻写并没有带来预期的效果,而是破坏了生命的延续性、动植物物种的独特性、多样性和稳定性,废黜了精神性(spirituality)的滋养,带来了一种深沉的“后人类痛苦”。

一 “技术态身体”奇观和“后人类之痛”

克里斯·希林认为,现代技术以三种方式作用于身体:(1)利用身体修复术(prostheses)修复身体的缺陷或不足,重实用效果,也兼顾人类身体的美感,目的是使接受者的身体具有健全人的功能,并使他们重新融入工作社区和生活社区。(2)利用技术扩展身体的潜能。使用技术恢复身体的机能和扩展身体的机能是有区别的。后者是一种激进的人—机器的联合,从而弱化了有机体和无机体之间的界限,加强了身体的能力,但基本上没有超出身体的需要,无论是多么虚拟的空间或成为赛博人,身体总是存在的。(3)技术被用于影响社区和政治的转化^[6]。通常身体修复在三个层面上展开:四肢的修复、知觉的修复和认知的修复,但从目前的技术水平看,后两项仍然存在着困难。《伊斯拉克玉米粥》借助于基因技术拓展人类认知能力这一技术想象,以极端的技术语境探讨技术对人类本质的改写,体现出一种深沉的后人类痛苦。根据麦考利的研究,“后人类痛苦”指的是:

在平凡的技术物件(artifacts)中,因人类为提高效率而打破时空限制、整合优秀资源而来的创伤确实发生了。后人类痛苦不仅仅是理论问题,它每天都发生在普通人身上。……当我们经历技术失败时,人类的主体性就受到挑战。我们潜意识地创伤性地放弃技术产品这种力量,却因之进一步受到创伤……。我们创造了技术物件,以便使“生活世界”

与我们一起痛苦。正是这种欲望,反过来影响了后人类理论的基本观念,使之在整体上不能协调“人类”和“技术”的边界之本质^{[7]x-xi}。

小说中的技术失败导致所有生命都和人类一起痛苦。它的开篇以丰富的想象再现技术带给人类的诸多弊端。乘飞机旅行时,飞机里地方狭小、拥挤、充满了细菌、食物难以下咽。飞机会发生故障,或延迟起飞,旅客们不得不拖着行李来回奔跑,或滞留机场数小时。这种焦虑构成了该小说逃离技术弊端的叙事基础。第一人称叙事者利用了这种奇异但又不太可靠的位面技术,来到了一个名叫“伊斯拉克”的位面,并通过所见所闻把人类在基因技术中可能犯的错误呈现给读者。

首先,在旅馆中她遭遇到类似于玩具“泰迪熊”的宠物熊,它们是用熊和昆虫等生物基因合成的生物,身长 6 到 8 寸,长着又细又长的尾巴,总是啃装订书用的胶水,添信封,钻被窝。更让她惊讶的是“伊斯拉克”人种的奇特:有 8 英尺高的女人用尾巴打扫街道;有只有叙事者腰部高的人,通过设在耳朵、嘴唇和眼镜片中的插件,进入计算机网络,边走边研究市场报告边谈话。自此读者可以得出结论,该位面的科技极其发达。有一个背着小书包去上学的孩子,面色苍白,眼睛细小,长着一个猪拱嘴,用四肢走路,戴着皮革手套或靴子,以免人行道划伤双手。公共汽车上的人更加奇异:他们的身材、身高、颜色都各自不同,有些人长着毛皮甚至羽毛,有人耳朵上面长着一堆树叶,风从开着的车窗吹进来,他在风中喃喃自语。

叙事者因饥饿来到一家咖啡馆,在那里遇到了名叫艾·里·阿·蕾的女招待,交谈中得知她是个玉米人,有 4% 的玉米基因和约 5% 的鸚鵡基因。她受过高等教育,获得过植物病理学的学位。她的女儿很美,但因为有鱼类生活习性,必须生活在北海里,依靠生鱼维持生命。身为母亲的女招待不得不在女儿两岁的时候,将她带到海岸边,把她放进汹涌、冰冷的海水中,让她自己游走,去面对世界。但对女招待来说,她的女儿也是人类的一分子。通过女招待,叙事者开始了解极端的基因技术对个人和社会所造成的不可逆转的损失和骨肉分离的痛苦。

“伊斯拉克位面”的技术一直微妙地照应着地球的科技状况,稍加放纵,该位面的技术悲剧就会成为地球的末日启示录。小说同时也暗示在基因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方面,除了“伊斯拉克”位面以外,还有别的位面在经历同样的技术态身体转化。叙事者与女招待的对话表明,地球位面也在实施植物基因

改造,只是尚未用在动物和人类身上。“伊斯拉克人”从前和地球人是一样的,但在大约一百年前,他们的科学家在位面旅行中发现并带回了应用基因技术,随后全民陷入了对该技术的迷恋,并把它应用于所有的生命形式,但后果是灾难性的:他们十年之内消灭了水稻、蝴蝶、萤火虫等,他们发明了鸡人、会说话的狗、会下棋的猫,人类的寿命也延长到五百年。所有这些基因成就都体现了后人类主义对于身体和非身体之间边界融合的梦想。正如麦考利所言,技术具有淡化身体存在的倾向,计算机技术使人把身体当作“有机的信息处理设备”^{[7]3}。他承认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人类主体性,但人类必须认识到人与机械之间的边界,否则会导致自我完全消解的新恐惧和新痛苦。“我们不断地遭遇到这种观念,即只有通过技术方法,我们才能充分成为人类,我们人性的程度和质量也是由我们和自身信息之间的关系来定义的”^{[7]4-6}。

“伊斯拉克人”的基因重组其实是一种极端的身体修复术,它建立在西方文化有关身体完美的虚假价值观和幻觉的基础上,假设了人类基因的重大缺陷,认为全面的基因置换能够矫正身体的缺陷。作者把这种狂热的基因技术与共同的贫穷和经济危机联系在一起,但没有交代因果关系。我们可以试着填充这一逻辑空白:要进行基因重组的科研,必须要有科研项目的可行性分析和论证;还必须有非常先进的生物科学知识和计算机技术等必要条件,再加上对基因改造狂热的科学家的努力,实验才能成功;实验成功以后,有可能进行小面积试点。这一技术呈现给人们的必定是光鲜的外表和满足人们需要的某些特质,如消除别人嘲笑的外表缺陷、内在的遗传疾病等,引起民众的羡慕;政府决策人物完全被说服并成为这一项目的支持者和热心推广者也是不可或缺的条件。

基因融合除了不确定的生物后果外,也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和文化后果。该城市的建筑物大小和风格混杂而奇特:有的房子如兔子笼大小,有的10层楼每层仅有5~6英尺高,有的四层楼比10层的还要高。作为城市景观的建筑,是为城市居民的衣食住行、休闲和娱乐而存在的,是社会文化的载体,却呈现出破败景象。当种属的内在规定性、个人的复杂性和人类的深度被技术追逐精炼掉时,社会就不再具有基本的共同信念和内在凝聚力,组织经济的方式必然陷于无效,经济的崩溃也不奇怪了。此种基因工程已超出了“人和修复术兼容”的范畴,超出了人类“自我定义”的心理和生理极限,达到荒谬的

临界点,成为改写人类生命的本质并威胁身体意义生成的元凶。技术他者和人类身体融合的失败使全民身体成了技术的实验品,很自然地引起自我和身份的焦虑,人们的主体性建构受到威胁,不再拥有统一连贯的自我认知和身份感,生命不再具有神秘感,人的价值被降低到工具层次,“人的本质”已被消解。显然,在作者看来,“人的本质”涵盖着理性、情感、语言、哲学、艺术、对自我和他者的思考、自由等要素,以及对人类基因的坚守。

此外,技术的进步也没有带来思想的进步,反而强化了阶级压迫下的身体政治,加深了社会的不平等,间接地摧毁了该位面的民主梦想。技术主要是由经济和战争需要驱动的,也不排除阶级、种族、性别、生态等多种因素,技术资源和阶级互相塑造、交织在一起。面对逐渐凸显的弊端,全民的狂欢和疯癫逐渐演化为悔恨和恢复原状的欲望。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禁令和措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他们枪毙了全部基因学家,毁灭所有实验品和实验半成品,把生物科技信徒送到沙漠去劳动改造,颁布了“基因纯洁条款”,“只有拥有99.44%人类基因的人才能从事专业性工作或政府部门中就职”^{[5]18},艾·里·阿·蕾只能做女招待。该位面的总理才90岁,又很健康,还能继续任职四百年。因为他的地位和权术,基因纯洁禁令不能在他身上生效。

基因技术对身体的操纵,抹去了自我和技术他者之间的本质界限。不可否认,人有一个生物学结构,人的本质表现为一个遗传结构稳定的有机体、人性和肉体自然结合的统一体。即便是人的思维能力超出了自然之身体,人也只有通过天生的躯体才成为其人。因此,破坏生命类属的内在规定性和身体的神圣性,仍是人类的不可承受之痛。表面看来,基因实验悲剧仅限于某些个人或群体,部分人似乎可以置身事外。其实,个人事件是群体遭遇的一部分,对个人所受不公正的冷漠往往埋下了群体不幸的种子。我们离小说描写的世界并不遥远,因为克隆技术和“人兽胚胎实验”都是非常真实的存在。数百年来,人类一直在动物、植物育种方面,采用生物技术进行遗传或优生改造,目前已经能够利用生物技术,把互不相干的生物遗传纤维缝缀在一起,似乎在进行着一种可与上帝媲美的创世记。技术是人类的存在形式,但如果尚未完全掌握基因技术,就把它用于所有生命形式中,人类就会成为自以为是的傻瓜^③。以下将分析《变化的位面》中的《永醒者之岛》的故事,解读基因技术在拓展人类智力潜能方面必须承受的界限。

二 “技术态身体”与人类的“精神性”

身体具有极大的可塑性(plasticity),但身体首先是物质的生理的存在,其次才是文化的存在。在技术和身体的互动中,“无身体的人类是没有感觉的人类,被剥夺了世界的味道和生活的乐趣。这样的人类不能代表我们未来的方向”^[8]。后人类主义视人的身体为硬件,思想或储存的信息为软件,认为人脑是一种信息模式,人可以存在于虚拟空间,可以用技术给人脑加添某种能力或升级软件。随着网络空间和人工智能的发展,身体被虚化,作为纯信息上传到因特网。但这种现象仍然不能取代人类社区的真正互动和真实的存在。正是在这种“身体信息化”的技术语境下,作者才有可能虚构出《永醒者之岛》的故事。故事以民族主义思想为叙事起点和技术发展的推动力,更像是一份冷静客观的社会学研究报告。“奥里奇”位面上有个名叫“海·布里萨尔”的国家,一群科学家相信睡眠是对智力的极大浪费。政府因惧怕敌国“纳姆国”可能的入侵,出于军事目的,希望利用身体实验来造就一批天才科学家,实现国力飞跃,增强本国科技实力。因此由科学家、基因工程师以及 20 名具有生育能力的男女青年自愿者组成的“超智能计划”研究项目得以启动。他们在婴儿身上做“无睡眠”实验,但第一批超智能婴儿出生后,在不到一个月至一年中相继死亡。

尽管如此,计划依然进行,因为谣传敌国正在研究一种利用空气传播的细菌,该细菌能使“海·布里萨尔”国所有男性丧失生育能力,这就赋予了这项研究以关乎民族存亡的现实意义。基因工程师们修正了原有方案后,22 对爱国夫妻参与了第二批超智能婴儿的实验。他们生下了 22 个健康的孩子。其中一个名叫哈·戴博的可爱小男孩表现突出,26 个月大时他每天只需睡 2~3 个小时。但该国的一个新闻节目却谨慎地提出了对“超智能计划”的理论和有效性的质疑,进而引发了“科技调查委员会”实施的一份调查。至此,该科研项目的部分恶果开始呈现:哈·戴博三岁半时已无需睡眠,但他没有对外界的敏感、对自然界的热情和人际交往的正常反应,也没有人类正常的情感和羞耻之心,只会跟在狗的后面跑。孩子们不会看人的眼睛,也不会用手指指示方向。父母们绝望地指出“他们在梦游”,因为实验“阻止了大脑获得完全的意识”^{[5]159-61}。尽管有种种的风险疑虑,但项目主持人乌伊·塔格教授仍努力维持该项目达 12 年之久。当孩子们长到 15~17 岁时,政府突然中断了该科研计划。

孩子们既没有时间感、地域感,也没有存在感,

但他们的身体却非常健康,并永远是清醒和警觉的。打造天才科学家的希望破灭了,政府拒绝为这些实验品负责,把他们放逐到一个岛上自生自灭,这就是“永醒者之岛”名字的由来。有些人躲在岛上的铁塔里观察他们,想拯救他们的志愿者被武力驱散。每隔一天,军舰会把面包、水果等无需烹饪的食物送到沙滩上。永醒者们生活倒退到原始状态:他们赤身裸体,男性互相打斗,争夺与女性的交配权,女性则从十三、四岁起每年生一个孩子,她们很少活过三十岁。政府未能让敌国跪伏在脚下,却使实验的参与者荒废生命,失去人类的尊严,而整个社会无力分担其中的痛苦,只好视而不见,装聋作哑。

以牺牲睡眠来提升人类的智力,完全摒弃人类生活的“休闲”,是基于不假思索的实用主义,否定了人类精神性的力量。阿霍认为,真正的“休闲”是一种“游戏”形式,它能够把我们从技术的繁忙中解救出来,使我们能够直面“存在”的本质和神秘,使我们不寻求加速掌握或控制“存在”,而是坦然接受“存在”的不稳定,向“存在”敞开,让它如其所是^[9]。故事的结尾暗示,人类为自身的进步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但技术未必能给人类带来真正的满足感,因为一只藏在苹果中的虫子也许会很幸福,逃离了世俗羁绊的宗教人士也许不再痛苦,但“永醒者”们已永远没有做梦、写诗和释放心灵的能力。“永醒者们”所遭受的,其实是把人类当作机械的去人性化行为。人类和机器终归有本质的区别,麦考利认为人类的主体性、自我意识和认知能力是机器所不能复制的。人类的认知仅能扎根于一定的时空,因而是脆弱的;而机器的编码总是稳定的,储存随时可用,没有人类脆弱的记忆,也就没有人类的焦虑和痛苦。但人类能够挣脱技科学的强制,揭示和利用信息,即利用叙事,穿透信息的复杂性,人类的脆弱性在这种意义上又成就了他的优越性^{[7]77-79}。所以,无论技术有多发达,人类的精神性仍是我们生命质量的保证。

从 20 世纪早期的优生学到当代的基因工程,人类追求科学和技术进步的脚步从未停止过,故事并没有表面上显示的那么荒谬,“身体修复术”与“思维修复术”的距离仅一步之遥。“伊斯拉克人”的基因重组和“超智能计划”研究项目的参与人也并非没有身体意识,但民族主义动机赋予他们一种高尚感或使命感,促使他们把个人权利让渡给自己所信任的政府和专家,并认可了这些专家的暴虐。此时的技术实践进入了一种“阈限”的、不确定的试误状态。这种整体性的基因渗透和置换,同样挑战了人类的本质,打破了基因技术发展的底线,人类的地位

和尊严如同实验用鼠。

“技术决定论”推崇人类身体和技术的融合,忽略了这一融合的极限,否定了人类“精神性”(spirituality)的力量。中国学者陈皮指出,人类有三分之一的时间用于睡眠,消除睡眠等于逆转自然规律、撕毁生命的整体循环和完整性,睡眠不足或质量不高,会导致疾病和智力下降。但睡眠不仅仅是“高等脊椎动物周期出现的一种自发的和可逆的静息状态”,而且是“一种精神需要”,人在睡眠中与灵魂做最本质的对话。在睡眠中安息的,绝不仅仅是我们的身体,还有我们的灵魂、伤痛和恐惧^[10]。小说使用的“恶托邦”叙事居于“乌托邦”和“反乌托邦”之间,它不再是封闭的结构,而是对当代社会问题的直接评论,意在揭示并引起可能的社会变化^[11]。小说摒弃了“乌托邦”的乐观和“反乌托邦”对技术社会的恐惧和否定,充当了展望遗传科学和遗传工程的光明前景和恐怖前景之间的缓冲空间,起到协调两极叙事的作用。真正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不是互相对立的,而是共同构成了人类的知识整体。小说启示录式的思考,并没有全面否定当代“技科学”的优点,而是提出了精神性对技术的反向平衡(counter-balance)作用,提供了一种走出困境的方法。

三 结语

现代技术对世界的进步有很重要的作用,有着良好的出发点和似乎诱人的前景,但技术所导致的负面效果往往是滞后的和不可逆转的。《变化的位面》中的两个故事表明,在现代技科学语境下,一方面,技术满足了社会经济和国家安全需要,另一方面,技术也经历了对人类身体的修复、身体潜能的拓展的“向内转”。在当今的技科学语境下,身体的信息化意味着人类想成为上帝,从认知层面上实现对身体的修复。极端的基因技术对身体的“嫁接”和“刻写”虽不会导致身体的完全消解,但会带来相应的身份焦虑、对人类本质的改写以及身体和心理两方面的后人类痛苦,使人类身体和主体性变得更加不稳定。小说批判了“技术决定论”的盲目乐观、技术可使人类身体完美、以及“技术态身体”可以成为技术进步的工具的假定,暗示技术关系是社会关系的一部分,理应与宇宙的循环模式相呼应,与人类的精神性相辅相成。在基因技术的实施中,人类应化生命的虚无为充实,而不是导致去人性化的后果。

注释:

① 技科学(techno-science)一词是一个跨学科概念,它

涵盖了社会学、文学、物理学、技术和艺术等诸多学科,由法国哲学家 Gaston Bachelard 在 1953 年首次提出,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法语世界流行,2000 年后在英语学界受到更深入的探讨。南京大学的蔡仲、肖雷波借用比利时哲学家霍特兹(Gilbert Hottois)的观点,认为该词指一种“技术内化于科学中”的复杂过程。“一方面,作为发展环境的技术意味着科学需要技术(工具和人工物)来推动其进步,工具本身成为研究对象和研究技术;另一方面,作为驱动力的技术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科学是以技术应用为导向(不一定是出于实用主义目的);技术进步开辟了新的研究道路(比如纳米技术)。总之,技术远非是科学研究的副产品,技术已经内化于科学中,导致科学和技术无法区分。同时,技科学也深深改变了传统的科学研究组织,它也改变了学术界、工业、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关系。因此这一个词语也指知识生产的新体制。”参见蔡仲、肖雷波. STS:从人类主义到后人类主义[J]. 哲学动态,2011(11):80-85.

② 参见克里斯·希林的《文化、技术与社会中的身体》一书,作者把身体分成五态来加以解读,它们是工作态身体(working bodies)、运动态身体(sporting bodies)、音乐态身体(musical bodies)、社交态身体(sociable bodies)和技术态身体(technological bodies)。笔者采用了中国译者李康的译法。希林的归类方法便于从社会学角度解读身体的存在形态;澳大利亚学者霍桑(Susan Hawthorne)则使用了“technobodies”一词来表达技术对身体的改写作用;爱德华斯、哈维和韦德(Jeanette Edwards, Penny Harvey and Peter Wade)使用了“technologized bodies”的说法。伊德(Don Ihde)在其专著《技术中的身体》中从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的角度论述了真实身体和虚拟身体现象。从广义的角度,本文认为“技术身体”、“技术化的身体”与“技术态身体”可以互换使用。

③ 作者并没指出“基因混合人”是否会感染动物和植物疾病,但鉴于跨物种基因混合存在着疾病感染的风险、心理和道德失控和社会失序的风险,《变化的位面》暗示社会需要特别的伦理思考和立法保障来应对基因技术。打破物种之间的基因界限意味着:即便是人类勉强能在既存社会秩序中生活,但如何恢复人类物种的独特性和进行灾难后重建,仍然是一大问题。

[参考文献]

[1] Burns Tony. Political Theory, Science Fiction, and Utopian Literature: Ursula Le Guin and The Dispossessed [M]. Lanham: Lexington Books, 2008.

[2] Clarke Amy M. Ursula K. Le Guin's Journey to Post Feminism [M]. Jefferson, NC: McFarland, 2010:11.

[3] Wash William, Ursula Le Guin. I am a Woman Writer; I am a Western Writer: An Interview with Ursula Le Guin [J]. The Kenyon Review, 1995, 17(3):192-205.

[4] Le Guin Ursula. The Changing Plane [M]. Orlando: Harcourt, Inc., 2003.

[5] [美]厄休拉·勒奎恩. 变化的位面 [M]. 梁宇晗, 译.

-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7.
- [6] Shilling Chris. The Body in Culture, Technology and Society[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5: 187-194.
- [7] Miccoli Anthony. Posthuman Suffering and the Technological Embrace[M]. Lanham: Lexington Books, 2010.
- [8] [法] 大卫·勒布雷东. 人类身体史和现代性[M]. 王圆圆, 译.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0: 326.
- [9] Aho Kevin A. Heidegger's Neglect of the Body[M].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9: 6.
- [10] 陈 皮. 睡眠的革命[M].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8: 20-120.
- [11] Stickgold-Sarah Jessie. The Textual Body: Genetics and Dystopia in American Fiction[D]. Brandeis University, 2011: 14-15.

The Posthuman Suffering in the Context of Techno-science

——A technological reading of The Changing Planes by Ursula Le Guin

CHENG Jing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t: In a Swiftian artistic imagination, Ursula Le Guin's *The Changing Planes* fabricates two stories about the extreme prosthesis through the generic engineering, and represents "the technological bodies" in contemporary techno-scientific context. Through the tragedy of genetic modification, the stories demonstrate that genetic technology may subvert "the essence of man" and cause the irreparable post-human suffering when it is used to reach man's intelligent and cognitive breakthrough. This essay traces the criticism of posthuman ideology of technology, points out that the novel warns against the unbounded merger of mankind and the non-human lives for the purpose of extending bodily potentials by using genetic techniques, and emphasizes the human spirituality as a counter-balance for the technological disasters.

Key words: techno-science context; the prosthesis; post-humanism; human spirituality